

儒商是社会文明的推动者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近80%。大部分人在企业就业,如果企业家都能做到仁义礼智信,并施行于企业,进而成为仁者、儒商,那么就能对员工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企业有秩序,社会有秩序,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会提升。如此,儒商将成为中国梦的推动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引领世界,中国人的道德文明状态却出现了大面积滑坡。传统儒家思想丢失,新的和世界同步的文明价值观却未建立。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市场经济三十年的探索,到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就是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为基石。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以诚信为基石,它的前景并不美妙,反而非常可怕。这种共识的取得,是每一个消费者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才形成的。这种付出代价的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知道了皮鞋可以用纸来做;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我们买过用硫磺熏的蘑菇和馒头,以及“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从穿到吃,危害越来越大;第三个阶段,就是药品质量出现问题,以“齐二药事件”和“欣弗事件”、“毒胶囊”为代表,当药品质量也不能让人放心的时候,生活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你会感到无处可逃。

今天,当“扶不扶”成为一个问题,“救不救”要先找证据,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了热情互助,见义勇为反而可能惹祸上身,“人人自危”不幸成为现实。礼仪之邦的中华大地,对道德文明的重构已经从文化的呼唤变成了现实的亟需。面对现实的挫折和困惑,我们不得不重新将目光投向传统,寻找中华文明原始的智慧之光,从中汲取力量,重拾自信。

“三大制度、文化、精神文明”

在技术上,中国有“四大发明”。在文化思想上,中国有“三大制度、文化、精神文明”,已经并继续影响全球。

第一,秦朝开设郡县制,是现在企业管理制度的鼻祖。自秦朝开始,废除周王朝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而确立了“皇帝-宰相”的管理制度,类似于“董事长-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管理制度。皇家相当于股东会,皇帝相当于董事长,宰相相当于总裁,其他大臣是管理团队。这套中央集权的体制,演变成今天包括欧美跨国公司都在内部采用的董事会体制,产权与管理权分开。

第二,从汉朝的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大儒董仲舒总结,确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三纲五常的确立,让整个社会步入有秩序、有规则的时代。儒家对各个阶层都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不仅规定了普通人怎么做,更规定了皇帝怎么做皇帝。

第三,隋朝开始,建立了科举制度。为全

球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建立了人才选拔机制,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等选拔制度都得益于科举制。以前的选官制度,主要是皇室成员推荐,民间很难进入体制内,也就没有上升渠道。通过科举选拔,基层的人可以进入“董事会管理团队”,宰相可以由民间人士来做。这就导致自隋朝之后,形成“唯读书高”的社会氛围,社会出现大量私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

这三个方面,包含了制度、思想和文化,形成了文明、秩序和价值观念支撑的中国软文化。在这套软文化之下,造就了以士绅阶层为主的中产阶级,既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子,也有“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儒商。这套文化体系,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对世界的影响不亚于“四大发明”。

今天全球商业规则仍然源自儒家思想,讲诚信,讲规则,讲底线。西方人同样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执行者,他们的商业讲诚信、讲规则、讲仁义、做慈善,都没有逃出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孔子的思想是全人类的思想,具有普世性。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在历数当今世界各种人为的苦难之后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宣言》从世界各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我们是孔子的故国,现在倒是没有执行好。现代文明是对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和细致化。这些年,西方人在不断学习儒家思想,并不断自我演变。

新商业文明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认为全天下都是大清朝的,全世界唯我大清最伟大、最富裕、最强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忽然发现外国的洋枪、洋炮远远强于我们的大刀、长矛,备感落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在五四运动、破四旧等各种运动中,中国人不断否定自己,学习西方,抛弃自己,脏水、孩子一起泼出去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精髓逐渐被抛弃。过去有儒家思想,有佛教,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近30年,没有信仰支撑,思想高度真空,导致不断出现突破底线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无道。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去年11月考察孔府,提出要发挥儒家思想的积极作用;今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带头,一要遵守法



制,行为符合企业游戏规则,例如WTO的规定;同时,要继承“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价值观。我们的核心,就是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爱财与唯利,是商人的本色,但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越道,要有底线。当然,在取之有道之后,还有见利思义。

对儒商来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真正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的层次。

日本现代发达的商业文明,就是把儒家文化和现代的法治结合起来了。日本的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著有《论语与算盘》,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精神基础。现在大家推崇的稻盛和夫,也是一位儒商,他的管理思想大多来自儒家。除了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的台湾,都是儒家和法治结合得很好的地方,出现了一批现代儒商。

重建文明,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是中国的商业精英下一步要推动的事情。对于重建,我充满信心,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大乱之后一定会有大治。

儒商的中国梦

重树现代企业家文明,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本身的价值,就是创造力,但要遵守规则,遵循良知;二是尽社会责任,以慈善推进社会改良与和谐。慈善就是儒家所说的“仁”,是仁的外在表现。

《礼记·大学》里有一段名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最后两句话,东汉大儒郑玄注解为:



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国际化充满信心吗?

人民币国际化会否失败?如果中国金融改革措施全面停顿将会怎样?这些都是笔者最近去欧洲路演时客户提出的疑问。

过去几年,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普遍乐观。但最近,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影子银行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消息不断,引发忧虑。2008年金融危机后,任何事都不该想当然,中国以外的人士有充分理由抱持这种怀疑态度。

如果我们全面看待这些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一列单向列车,不明朗的是其速度而非方向。政治举措是推动一种货币全球化的四个关键要素之一,其余因素包括活跃的金融市场、可观的经济规模以及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中国政府已展示出坚定的政治意愿,决心要推进经济改革。过去十年,中国全面放开人民币贸易结算,全球有四个城市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当局并与其他国家的央行签署24个人民币互换协议,还增加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

其他措施陆续而来。最近,中国在上海设立自贸区、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并批准沪港股市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当局政策变化之快,远远超过预期。

此外,纽约、多伦多、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都表示有意成为下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至少40家央行已投资人民币,另一些银行也正准备行动。这么多国家竞相分一杯羹,他们不可能全都看走眼。

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取得实质性进展。去年年底,A股市场总市值已达23.9万亿元(30万亿港元),债券市场市值达29.9万亿元。香港也应被考虑在内。2013年发行额高达2910亿元的点心债,大部分是在香港发行。

此外,自2010年以来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外汇日交易量已差不多翻了两番,2013年已高达1200亿美元,推动人民币交易量跃居全球货币第九位。

过去十年,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不断进步,有望超过美国。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增长步伐仍是个未知数。然而,即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减慢,但却不会完全停步。

情况可以参考日元。日元一度前景良好,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失去上涨动力。如今,日本相当大部分贸易额仍以日元结算,该国经济规模仍然庞大,令全球贸易伙伴难以忽视。中国GDP是日本的近一倍,但只有17%贸易额以人民币结算,可谓潜力巨大。

中国正在小心审慎地向人民币国际化方向迈进。正如其他所有开创性的政策一样,中国已制定制衡机制,淘汰偏离其改革蓝图的参与者。例如,政府将风险管理任务分配给所有市场参与者,包括银行。市场参与者都要遵守规则,配合监管机构议程。

有志在开放资本账户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银行,则一直承担把关的角色,帮助控制风险。由于公司已经可以更灵活地管理跨境

资金流动,银行必须要弄清这些资金是否用于支持客户的真正业务需求。这将有助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银行一直致力担当中间人角色,将企业意愿向上反映,将政府的关注向公司传达,并帮助企业了解法规、找寻机遇,尤其是那些已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大银行。

在开放资本账户方面,中国已走过漫长路。然

而,这一切仍只是起步。最新批准的“沪港通”计划释出信号,说明政府将为认真的市场参与者推出更开放的措施。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启动,所有迹象都表明其已走上一条不归路。公司只要意图正确,就不妨信心满满地加入。(凌嘉敏)



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将推动金融市场的制度改革

关于中国当前是否适合开放资本项目的争议被重新提起。学者中国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持忧虑态度的学主要担心在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汇率只是有限弹性的市场制度环境下,开放资本跨境流动将隐含巨大的金融风险。对此,笔者不以为然。

就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实践而言,资本项目开放都不是绝对的开放,而是有条件的开放,同样,资本流动管制也不是绝对的管制。国际上关于资本项目开放和管制的定义是依据其开放程度的不同来界定的。实际上,目前完全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并不多,只有美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也并非完全不干预汇率。就以我国目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来说,2%的当日波幅、市场供求和央行指导相结合的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也不算是固定汇率制,应该算是有限制的浮动汇率制,而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是建立在绝对的固定汇率、完全的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充分有效性的理论前提下的。

国际实践经验证明,资本项目开放、货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之间不存在固定的秩序先后。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美元的国际化是建立在利率市场化基础上的,而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日元的国际化与之同期发生,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事实表明,先改革利率、汇率制度和先开放,并同时辅以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没有优劣之分,日本和美国的顺序不一样,但开放实际上并没有造成学者以经济理论推导出来的那些风险。

既然风险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么,资本项目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利大于弊。

首先,开放本身将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改革。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通过自由贸易渠道,彻底融入全球分工市场,中国也由此成为国际经贸大国。事实表明,对外开放有效促进了中国国内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并逐步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游戏规则。同样,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会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在这种趋势下,金融市场的制度改革必然会增加来自内外部的动能。

其次,提高现有巨额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截至2013年底,我国对外金融资产总额5.93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3.96万亿美元,拥有1.97万亿美元的对外净债权,投资收益却是逆差559亿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我们的外汇投资收益之所以体现为逆差的主要原因与资产结构有关。目前,我国对外金融债权的65.3%体现为庞大的储备资产,金融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只有2.8%,而海外流入中国的资金平均投资收益率是5.74%,其投资结构中六成是直接投资。因此,要提高我国金融资产的对外投资收益率,首先要改变金融债权的结构,而改变金融债权结构的有效途径就是开放资本项目,让居民有充分的跨境投资渠道,用手里的外汇资产去获取更高的收益。

第三,提高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大国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根据英国央行研究报告预测,如果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让居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选择个人资产的配置,那么到2025年,中国对外资产与负债与全球GDP之比,将由目前的不到5%升高至近35%。IMF的研究报告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开放资本账户之后,可能导致中国海外资产存量与GDP之比调整15%至25%,外国在华资产存量与GDP之比调整2%至10%。”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必须以资产国际化为前提,而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恰好就是在创造资产国际化的前提。

(林采宜)